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6.4

一年出版4期，以17種語言刊出

社會學、權力、政治

Anthony Giddens

希臘的經濟困境

Vassilis Fouskas,
Maria Markantonatou,
John Milios,
Spyros Sakellariopoulos,
Stratos Georgoulas

拉丁美洲 墮胎權的抗爭

Julia McReynolds-Pérez,
Susana Lerner, Lucía Melgar,
Agnès Guillaume,
Erika Busse

阿拉伯的社會科學

Mohammed Bamyeh,
Seteney Shami,
Idriss Jebari

特輯

- > George Ritzer 談麥當勞化和生產消費
- > 與全球社會學超過40年的關係
- > 介紹日本編輯團隊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6卷 / 第4期 / 2016.12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回首過去，放眼未來

我們這期繼續回首過去，放眼未來。我們回顧了《全球對話》過去的六年發生的大事，從社會運動如 Indignados、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到其他的右派運動像是埃及、土耳其、波蘭、匈牙利、菲律賓、阿根廷、巴西等的威權政府。這個全球趨勢可以部份歸因於全球資本主義如何吸取的國家的自主性而擴張，導致了左派和右派的民粹浪潮，並且右派民粹仍持續升高之中。

我想我們從 Anthony Giddens 的訪談開始是再好不過的了。Giddens 是理論家也是公共知識分子，他曾經稱全球化是非常有威力的。Giddens 是英國上議院的榮譽議員，並且繼續支持他所關心的問題，像是氣候變遷以及在數位時代的影響。

全球化的黑暗面則可以在 SYRIZA 的命運中看到，這個運動幾乎讓歐盟臣服，但是最後臣服的是希臘。我們刊登了五篇文章討論由歐盟施加於希臘的摺節政策如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把貧窮帶給了希臘，卻讓那些上層階級更富有。

在拉丁美洲，超過時的社會民主經驗，也是所謂的粉紅潮流，最後卻導致了國家的紛紛右轉。我們有三篇文章討論關於女性墮胎權利的議題。創意的抗議在阿根廷、墨西哥、秘魯等引起了不小的波浪。特別有趣的是如何使用同樣的藥物去避免或是中止懷孕。

關於阿拉伯社會科學，我們刊登了三篇文章討論。第一篇文章是由 Mohammed Bamyeh 所寫的關於該學科於阿拉伯世界的狀況。第二篇是 Seteney Shami 對於社會科學下層基礎的重要性的強調。第三篇是 Idriss Jebari 從批判的角度去討論阿拉伯之春與相關論述，認為該運動為阿拉伯社會科學注入了活力。

我們刊載了知名社會學家 George Ritzer 的訪談節錄，由年輕的科索沃社會學家 Labinot Kunushevci。Edward Tiryakian 則提供了他從 1974 年與 ISA 的過往歷史。最後介紹了 Satomi Yamamoto 所帶領的日本翻譯團隊。我也很高興跟大家介紹我們第十七個語言的版本：孟加拉，是由位於 Dhaka 的 Habibul Khondker 所帶領的。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Anthony Giddens 是知名的英國社會學家，也是上議員榮譽議員。其討論社會學在政治中的挑戰。



希臘的經濟困境。本期有五篇文章討論歐盟對希臘的高度管制和如何失敗。



拉丁美洲的墮胎權。本期有三篇文章討論墨西哥、阿根廷、秘魯的抗爭。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贊助。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Eashrat Jahan Eyemooon.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n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arjan Namaz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taro Shimokawa, Shinsha Kameo, Mizuki Ichikawa, Hayato Ishihara, Hiroki Kawabata, Hiromi Murakami, Kenta Kajitani, Kento Kusudo, Hirotaka Tanaka, Chiye Yamada.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Adrianna Drozdo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ș, Corina Brăgaru, Nicoleta-Mădălina Ailincăi, Costinel Anuța, Adriana Bondor, Alexandra Ciocănel, Tatiana Cojocari, Andrei Dobre, Iulian Gabor, Ștefania Cristina Ghioceanu, Alexandra Isbășoiu, Rodica Liseanu, Mădălina Manea, Anca Mihai,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ș-Mihai Muș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Ion Daniel Popa, Ioana Silistraru, Eliza Soare, Adriana Sohodoleanu, Diana Tihan, Elena Tudor, Carmen Voinea,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回首過去，放眼未來 2

社會學、權力、政治：訪談Anthony Giddens
Peter Kolarz, 英國 4

> 希臘的經濟困境

希臘：地緣政治和破產的歷史
Vassilis K. Fouskas, 英國 7

希臘的國家節制政策
Maria Markantonatou, 希臘 10

SYRIZA：從顛覆到實用主義
John Milios, 希臘 12

希臘金融危機的贏家和輸家
Spyros Sakellariopoulos, 希臘 15

希臘紓困是國家和企業的聯合犯罪
Stratos Georgoulas, 希臘 17

> 拉丁美洲對墮胎權的抗爭

米索前列醇時代的阿根廷墮胎權運動
Julia McReynolds-Pérez, 美國 19

墨西哥對墮胎權的翻轉
Susana Lerner, 墨西哥, Lucía Melgar,
墨西哥, Agnès Guillaume, 法國 22

墮胎作為暴力：秘魯的鬥爭
by Erika Busse, 秘魯 24

> 阿拉伯的社會科學

簡介阿拉伯社會科學
Mohammed A. Bamyeh, 美國 26

阿拉伯世界新社會科學的下層基礎
Seteney Shami, 黎巴嫩 28

阿拉伯社會科學：阿拉伯之春的前後
idriss Jebari, 黎巴嫩 31

> 特輯

麥當勞化和生產消費：訪談George Ritzer
Labinot Kunushevc, 科索沃 34

與全球社會學超過40年的關係
Edward A. Tiryakian, 美國 36

《全球對話》的日本翻譯團隊 38



> 社會學，政治，權力

訪談 Anthony Giddens



| Anthony Giddens.

PK：你處理了很多議題，包括了結構化理論，歷史唯物論，晚現代性，全球化，個人生活和性的轉變，第三條路，氣候變遷，歐盟的前途等等，而最近則也討論了科技革命。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覺得共同的關懷是什麼呢？

AG：我總體的關懷是去關照現代性的本質，也就是工業秩序的興起和在世界各地的傳佈，這是目前最具革命性的一股潮流。對我來說，歷史是不連續的，所以沒有一種演化性的模型是可以用來解釋這個歷史變遷的。人們也處在各自的位置之中，在特殊的環境下行動，有著不同的地理和社會脈絡，限制了行動者，但也被行動者所形塑。我想我並不同意涂爾幹的社會科學觀，因為行動者在其觀點之中是被動的，但是我們是具有能動性的。高夫曼是我認為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他強調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行為的技巧性的本質。許多人也試著把這樣現象連結到巨觀的解釋，這並不容易，但是是很重要的。以前的社會學家所描述的世界好像人們只是巨觀社會結構的產物而已。但我試著要去

Anthony Giddens 在 1970 年代是英國社會學的指標人物，他首先帶領了重新詮釋古典社會學的當代風潮。他剖析了結構中的能動，並連結巨觀和微觀，以及全球化下的日常生活。最近他則處理了科技革命的後果和氣候變遷對人類所帶來的影響。他寫了超過 30 本書，並且是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的前院長和榮譽退休教授。他也是 2004 年被選為英國上議院的榮譽院士。本篇訪談聚焦在社會學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Peter Kolarz 是英國 University of Sussex 的社會學博士，他是 Technopolis Group 的政策顧問，並且撰寫了許多政策的文章，包括英國和歐盟的。其著作包括《Giddens and Politics Beyond the Third Way: Utopian Realism in the Late Modern Age》(2016)，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這個訪談在 2016 年的 6 月 8 日於英國上議院進行。

把這個結構和行動的細節解釋清楚，而這也是我向來對於溝通和連結有興趣的原因之一。而我們日常生活和認同的轉變和許多大規模的社會問題是同等重要的。

PK：所以，若是有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存在你的作品是用來追求政治和社會變遷的，那會是什麼呢？

AG：我想那會是我們正在講的事情的形式，也就是在人們生活中互動和被更廣大的社會結構所形塑的細節。在政治中也是如此。

>>

經過設計的政策從來就是不足夠的，而且會有反作用力。

PK：在我 2016 年的書《Giddens and Politics Beyond the Third Way》中我強調了烏托邦實在論的這個概念，你還在用這個概念嗎？

AG：我仍然用烏托邦實在論這個概念。整體的挑戰是去連結烏托邦理想論和現實政治。這是兩個極端。缺乏理想的政治是沒有目的的。所以我們在任何的時候都要必須去想像這種政治的反面。同時，理想就是敵人。烏托邦現實主義似乎就是一個似乎讓我們認清現實又讓我們保有理想的方式。這是一個讓我們敏銳思考政治和事業的方式。在民主政治中，一個只為了贏得選舉的政黨是不會贏得所以選舉的，但也沒有人會只講崇高的理想卻不管民眾日常生活的需要的。

PK：在你 1990 年代關於全球化和第三條路的作品中，你會怎麼看現在的政治？你有什麼事情是覺得仍然和當前的政治有著重要性、但還沒有被妥善處理過的呢？

AG：我有點想不起來了，但是那個時候全球化的概念（個體、組織、國家之相互依賴的增加）是很新的，特別在政治脈絡中是如此。讓政治人物慎重看待這個概念是很難的，他們會疑惑的看著我。可是後來事情就突然顛倒過來，要讓政治人物不講全球化都很難。但是他們都在很粗糙的層次上談。不幸地，許多政治人物和社會科學家把這個概念限縮成全球市場的擴散。而全球化的驅動力最重要的就是通訊，特別是在科技革命之後興起的電子通訊。

我用「第三條路」這個概念其時是有些不情願的。對我來說，這的確意味著發展一個在政治上左和右之間的一個選項。但我不太把他看成是新自由主義，也就是毫無限制的市場擴張。在我 1998 年的書《第三條路》中，我說「金融市場的管制是世界經濟中最重要議題」。我從以前到現在都是積極政府的支持者，這不能被化約成國家，但是可以從許多政府部門而來。我從以前到現在也都支持發展全球治理，雖然極具挑戰性。

對我來說，不平等是個關鍵議題，若任何人看我的作品，就可以輕易知道這一點。

現在這議題變得更重要了，因為極度的不平等在金字塔的收入分配結構中誕生，而且生產力減低了，於是工資降低，許多人從事低薪工作。Thomas Piketty 的書《資本論和二十一世紀》成為了暢銷著作，因為其提供了一個對於結構如何產生不平等的有力解釋，以及一些相應的對策。

但是政治是國家的，世界卻是全球的。所以這裡還有一個關鍵的事情是：我們怎麼在國家政治和全球世界中找到平衡。民粹主義其實就在這個空隙之中大量湧現，這也是人們知道國家的政治人物並沒有他們必須宣稱所擁有的權力。

PK：你覺得有什麼方式可以介入這個國家政治和全球化與不平等的這個脫勾之中呢？

AG：我想應該要有方式，而在我討論歐洲(1)的書中我說到對於避稅天堂現象的因應，翻轉西方經濟的去工業化，以及製造業的重新啟動，但會是和以前很不一樣的方式展開。這是和科技革命一起伴隨而來的，因為一但金錢電子化之後，金錢可以任意在世界上流通，這也是為什麼會有避稅天堂。但是，同樣地，對於貪污的金錢也很難藏匿了。我想全球的民意也都反對可以很容易藏匿貪污金錢的機制。

有效（更別說民主）的全球治理只是幻想而已。不過我們的確有許多組織試著要去合作解決全球問題。譬如說巴黎的氣候協定會變成怎麼樣將會是很有趣的問題。該協定會變成空談嗎？我們不知道，不過這和之前的協定有著很不同的形式。你可以看到該協定的確仰想到石化產業。是有可能產生低碳的世界革命的，但是根本的問題的多快達成，或是反過來說，有多慢。馬克思說「所有都化為空氣了」，而或許那會是結果也說不定，總之我們要看看。總之，由快速、廣大的科技革命所導致的新的全球化是我們談論的重點。

PK：全球化做為時空的壓縮已經成為你著作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透過資訊和通訊科技而得以可能，並帶來了風險和機會。你認為有可能去掌控它，「乘著全球化巨浪而前進」，或是就是跟著它就好，然後看看會怎樣？

>>

AG：網際網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網路是前所未有全球化場域，它連結了個人親密性。但是這只是科技革命的一環而已，其他的像是超級電腦，機器人等。我認為超級電腦是主要的鍵結。現在的智慧手機比幾十年前的超級電腦還要有威力。這個巨大的演算法力量進入了日常生活，企業、國家中。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被影響著。這是一個每一件事情都對每個人來說是可見的世界，因為智慧手機已經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裡面出現了。許多的移民從受壓迫的國家逃到其他的國家就是戴著智慧手機找路的。這是一種廿一世紀的移民，就像 IS，混合著中古世紀的暴力和現代個電子科技技術，這是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

許多人把這個科技革命看成生產破碎的世界，但是許多的創新已經被國家所主導了，並且是透過半軍事的目的而得以可能。網際網路好像很輕飄飄的，但是那是透過海底電纜和衛星資訊的傳遞才得以可能的，這都是要透過國家和國家權力的。地緣政治的重新浮現似乎沒太意外。大公司和廣告是驅動力之一。這是新的環境，影響並非完全來自政治，但是還是透過權力，不論是國家或是企業。沒有人會想要一個色情圖片隨處可得、免費的世界。那或許有害，或許沒有。我們不知道，因為一切都是新的。

PK：讓我們談談當今的政治吧。你有看到對於未來左派的發展有建設性的辯論嗎？

AG：我們必須要去試著找到一個中間偏左的道路，第三條路的辯論是從對於我們生活造成的巨大改變所開始的，而我們今天也必須這麼做。我們必須看世界上的大變遷，看在政治上怎麼樣處例，看怎麼和既有的國家和國際政治接軌。在工黨之中已經發生的和 Jeremy Corbyn 的到來是混雜的，是一種科技的新世代，不過早在之前就已經開始醞釀了。

我們左派必須面向未來。我們已經超出所謂第三條路辯論了，而新的想法也是必要

的。我不認為事情都變得破碎化，那不是真的。你還是要和權力政治打交道，還是處理大問題，像是在全球資本擴張下的平等社會，以及如何解決避稅天堂的問題？所以權力還是重要的。在國家之間和國內民主政治的合作也是重要的。

PK：那把我帶到了我最後的一個問題。你相當成功的從學術轉換到政治中。我很有興趣中聽聽你作為一個在政治場域中的社會學家，對於有志這條路的學者而言，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AG：我在政治之中，但是並不屬於政治。我是學術人且一直以學術人自居。我大學是一個對我來說最自在的地方，像家一樣。對於參與政治的學術人最怕的是失去兩邊的聽眾，因為你必須要背叛學術的客觀性，但是卻又不是很了解政治，所以很容易進退失據。

學術和政治是很不同的，所以沒有太多人可以連接這兩者。智庫是兩者很重要的橋樑，很依賴學術研究，把研究轉譯到政策計畫中，並且和媒體接近。頂端的智庫和政府有很緊密的關係。我不是說這是唯一途徑，但是當 1990 年代我決定要和政治扯上關係之後，我接觸了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IPPR)，是少數幾個我知道的治物。那裡我有辦法建立一個政治人物的網絡。IPPR 和其他國家也有連結，包括美國。我從來沒有成為正式的政治顧問，而也會持續把我自己看成是學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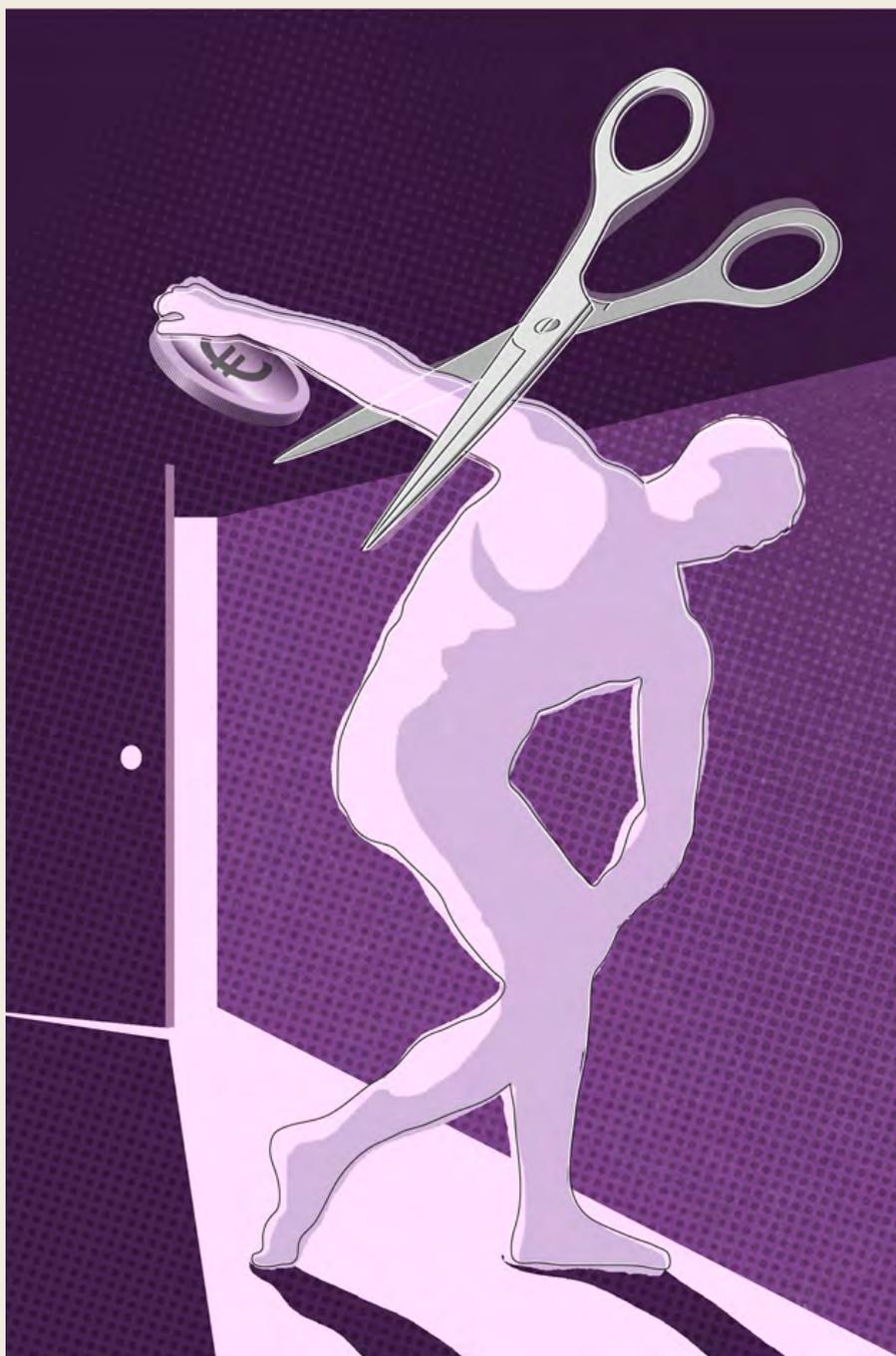
來信寄給 Anthony Giddens <Ax.Giddens@lse.ac.uk>
和 Peter Kolarz <kolarz.peter@gmail.com>

> 希臘

地緣政治和破產的歷史

Vassilis K. Fouskas,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英國

破產而非鐵餅象徵了希臘的歷史。Arbu繪圖。



希臘位於巴爾幹半島的南端，於1930年建立，由魯米利亞，埃維亞，基克拉澤斯群島所環繞著。希臘的誕生是帝國地緣政治的意外，而非由工業布爾喬亞的經濟擴張所導致。希臘的建立被西方的帝國看成是地緣政治上的必要，為了用來嚇阻俄國和埃及在東地中海的領土擴張，而不是像是德國容克貴族或是義大利皮埃蒙特那樣所進行的政治革命所建立的國家。地緣政治因素是希臘建國的重要因素，而這也是了解現在希臘負債危機的關鍵所在。從現代的希臘創立以來，西方就一直利用著希臘的地理位置，為的是西方的利益，而非希臘本身。

>19 世紀的全球金融連結

為了打脫離鄂圖曼帝國的獨立戰爭，希臘像西方借了很多錢。在1820年代，希

>>

臘分別收到了 800,000 英鎊和 2 百萬英鎊的貸款。這個新的國家在 1824-25 年之間經歷了第一次的破產，無法還錢給法國和英國。在 1823-33 年，另外了 6 千萬金法郎，全部用在軍隊開支，這導致了 1843 年的破產。

在 1827 年到 1877-78 年之間，希臘被排除在西方金融市場之外。這 50 年間，各國政府依賴內部借貸，同時鼓勵從希臘富人那邊得到投資，並和猶太與美國商業階級買辦一起，在鄂圖曼帝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希臘低度的工業發展和小規模的經濟也讓這個高度依賴其他國家的政體在 1893 年再度宣告破產。

然而，儘管其頹軟金融和低度發展的銀行與工業，希臘在西方國家的眼裡還是用地緣政治上利益。當奧匈和鄂圖曼帝國撤退後，空檔區域就被俄國和西歐帝國主義所介入，現在被義大利和德國所更新。新教的巴爾幹諸國對於西方來說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興起對抗鄂圖曼土耳其的代理人戰爭。在一次大戰結束前，鄂圖曼被趕出歐洲，而巴爾幹和東歐以及中東的邊界都被重新劃分了。

在領土與人口的征服之下，希臘在 Eleftherios Venizelos 的自由民族主義政府下有了廿世紀前二十年的工業發展。在英國的支援下，Venizelos 領導了一場代理人戰爭，對抗在安那托利亞的凱莫爾主義。結果就是兩敗俱傷。雖然希臘有 1.4 百萬之多的基督教難民湧入，但是它達到了族群的多元性，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反之，土耳其失去了一些商業階層，然後依賴威權政府的

經濟發展，並且無法達到族群和宗教的多元。

在沒有強健的經濟基礎之下，

統治精英和帝國利益的緊密掛勾，希臘沒辦法有效利用其地緣政治的優勢。因此，儘管有優勢，卻成了負擔。於是這產生了付款問題，並且和為了資助侍從主義的腐敗政府而使用的內部借貸問題，負債於是不斷累積。

> 1929 年的金融危機

在 1929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希臘在 1932 年遭遇了第四次的破產。其後，獨裁者 Ioannis Metaxas 採取的進口替代的工業政策，大幅提昇了收支的平衡。此外，帝國的火炬交接給了美國，冷戰時代希臘的地緣政治保證了美國資本和貸款的持續流入，讓希臘的左派持續邊緣化，這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

然而，再一次地，希臘又更加依賴。60 年代希臘銀行總裁 Xenophon Zolotas 到雅典見美國大使想要借款的時候，被用地緣政治的利益衝突這個原因所拒絕了。該大使說若希臘想要借款，那就必須接受 Dean Acheson 的賽普勒斯計畫，這是由北約協商出來的，去分割在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島，並且忽略當時賽普勒斯領導人 Archbishop Makarios。因此，地緣政治的議題和欠債問題有著相互交換的關係。這都是由北約、西方、美國所得利的計畫，而美國透過中情局則在希臘扶植了獨裁者，只有在 1974 年賽普勒斯被分割的時候民主才被恢復。

從 50 到 70 年代，希臘

無法趕上西方。而在這段期間，西方奉行需求面的凱因斯計畫，但是希臘卻追求的卻是後來被稱為西自由主義的政策，供給面和貨幣主義主導，這主要是因為冷戰政治所導致。雖然親俄的左派再 1944-49 年的內戰中被打敗了，人民還是相當支持，讓政府害怕讓社會參與政治。政治參與和需求面的經濟政策再 1974 年前都是停滯的。

而 1974 年之後，繼任的希臘內閣是右翼的 Constantine Karamanlis (1974-81) 和社會主義的 Andreas G. Papandreou (1981-89, 1993-96) 所主導，開啟了需求面的循環，僱用了黨政人士到政府之中，把私人企業國有化，而特別在 1980 年代資助了希臘的福利國家，透過的是無止盡的借貸，而非增稅。即使 1981 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希臘還是持續需求面政策，但是其他西方國家都已經轉性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化政策了。

再一次地，地緣政治的考量是重要的。希臘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早了 5 年加入共同體，為的是去穩定北約的南方，同時美國的資本投資在希臘也快光了。1980 年代，德國和法國的資本逐漸佔據了希臘經濟，並且把國家推向新自由主義，讓希臘成為巴爾幹半島資本主義的中轉站。

> 歐洲持續惡化的經濟危機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特別是在 2001 年加入歐盟之後，希臘的競爭優勢大幅滑落。傳統的可獲利的經濟像是紡織業已經消失了。而金融和銀行則主導了希臘的經濟，並擴散到巴爾幹半島和

>>



近東。公共資產被私有化，整個國家對於外部和內部的融資借貸已經到了把公共資產抵押給外國資本，並且失去了經濟的主權。甚至讓人認為「依賴」兩字都不足以描述這樣的處境。

當全球金融危機到了歐盟後，希臘受害最深，因為希臘市政個新自由主義金融市場鍊的最薄弱的一環。二十年的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和之後的擲節與紓困，這對希臘歷史上的經濟問題並沒有幫助。工業倒退了，制度會壞了，大量的負債比和財政赤字。真正需要的是強健的公共投資，工業和農業，以及綠產業。同時，獨立的外交政策也可以真正從希臘的地緣位置上獲利，避開巴爾幹和近東的紛擾。若這無法在歐盟發生，那麼問題在

歐盟，不在希臘。■

來信寄給 Vassilis Fouskas
<v.fouskas@uel.ac.uk>

> 希臘的國家 擲節政策

Maria Markantonatou, University of the Aegean, 希臘



在Athens市中心的小販在收拾其攤販。Petros Giannakouris/AP攝影。

歐 盟歐盟成立以來就採取了很多海耶克的自由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和財政獨立於政治和民主之外。這個計畫被中央銀行所執行，而且需要不同的經濟體參與，即使在黃金時期，這樣的政策也沒辦法讓所有國家得利。歐盟的市場走向在全球危機後便得更明顯了，即使有政治力量在阻止，但是從2010年後危機的管理，特別是在希臘已經使得「社會的歐洲」成為了失敗的目標。

從2010年開始，經濟自由主義便是希臘的政策方向，這是從被國際市場排除之後開始的。過去60年來，各種意識形態的政府（社會民主、右派、左派、科技官僚、聯合、臨時）也制度許多以「理解備忘錄」為架構的政策法律。這些是希臘政府和國際債權人之間的協議。為了讓希臘可以得到貸款去償還債務，擲節措施於是展開，並制定友善企業的法律，方面於私有化的進行，並且從90年代開始社會福利就大幅縮減。

從備忘錄1開始，然後透過今天的備忘錄3，財政紀律已經變成新的教條。從債權人的角度來看是在憂慮「希臘脫歐」，這種威脅、壓力、心理恐懼已經蔓延開來，包括了罷工、抗議、佔領、新設運等興起就是在回應這個局面。

擲節政策的結果是，從2010年希臘的GDP跌落了27%，這彷彿回到了1930年代。生活水平急速降低，工資和年金被砍從20%到50%，稅收增加，許多人變成貧窮。公部門支出縮減，而且許多公共財產被私有化。公共組織，包括了公共企業、學校、醫院、難民營等都關閉或合併了。剩下了制度則成載過度，無法滿足增加的社會需求，所以福利縮減變差，包括了健康、教育、社福等都是如此。

希臘失業率從2007年的9%攀升到2014年的27%。勞動階級不再盼望未來。很清楚的是，經濟不會馬上恢復，而超過一半的希臘青年沒工作，勞動條件危險，新的勞動人口則要面臨很多問題。家庭也越來越難，這也挑戰了希臘的家庭模式和半調子福利國家制度。雖然家

>>

庭模式被認為是未發展資本主義的徵兆，這也是歐盟備忘錄中的現代化改革所提出的說法，但是並沒有證據顯示希臘正邁向歐洲式福利國家。把希臘的家庭模式和剩餘福利國家看成是必要的改革，並且強調去管制和邁向市場模式，這意味著今天在希臘社會福利只限於那些有能力買得起的人而已。

這個去管制化還沒有成為任何社會行動者對話的結果，也還沒形成社會共識。國家和歐盟的決定是不透明的，透過所謂「緊急程序」，這程序只是國家精英的方便門而已，並且在危機中形成，讓國家和國際的政治行動者的任務與責任變得更加劃分不清。希臘選民已經把政治決定排除掉了，而歐洲經濟財政事務委員會則取代了國會。科技官僚則在 2011 年興起，以及跨國銀行就像是首相。同時，國家的手段則形不通，在危機期間被取消或是被看成是取消的。

博蘭尼的意思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分離是市場自由主義的內在邏輯，希臘就是最好的粒子。市場系統一直是國家有計畫的介入的產物，這在備忘錄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這也形成了或許是歐盟歷史中最細緻的政治介入例子。

在博蘭尼對於 19 世紀資本主義的分析中，自由派譴責危機的誕生和自我管理市場的生產是要歸咎於某些社會團體。同樣地，當代的希臘所見到的普遍的論述就是譴責社會：勞工拿太高的工資，公職人員太多了，社會福利太好了，公共財產太大了。因此擰節就成為了合理的懲罰。這個懲罰是設計來讓市場恢復的。

希臘的危機管理就是歐盟擰節制度化策略的一環。一個方式就是財政壓縮，給非政治的歐洲組織可以告進一步監視國家預算。但是危機已經浮現檯面，結構的赤字和歐洲貨幣聯盟的脆弱已經人人皆知。

因為歐盟的經濟已經被導向了競爭的新重商主義，極右派和新法西斯力量也在選舉中有所斬獲。對歐盟樂觀的人已經轉向國家主權和民族主義了，這可是才在不久以前被認為過時的概念。要求「更歐盟」或是「更整合」的說法聽起來只是修辭而已，歐盟精英則擁抱經濟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可以延緩擰節或是財政紀律的方式，不讓那些正在結構轉型的國家去增加給予勞工和公共支出的資金。

懲罰性的擰節，憲法化的財政管制，和新自由主義、歐盟內部的殖民主義讓勞動條件惡化，並且開創出了更進一步的危機，也讓社會去管制化和政治不穩定更加惡化。只要沒有好的計畫去擺脫擰節政策，國家經濟之間的不對稱和階級不平等只會增加，並且讓人們以為決

定只會被統治階級精英所制定。歐盟懷疑主義者、反全球化人士對於瓦解歐盟的論證只會進一步吸引更多的聽眾。問題在於這會以什麼樣的政治形式展開，以及什麼樣的社會力量會主導一切？那些爭取民主化和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力量會擴散開來嗎？或是歐洲的極右派將會有更進一步的民族主義轉向？現在，博蘭尼的「雙重運動」的鐘擺顯示了市場力量和其政治代表將要取得成功了，讓民主倒退，並且會開啟一個黑暗的未來。■

來信寄給 Maria Markantonatou <mmarkant@soc.aegean.gr>

> SYRIZA 從顛覆到實用主義

John Milios,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thens, 希臘



| SYRIZA的集會於Athens。

SYRIZA (希臘激進左派聯盟) 在 2004 年成立，是一個鬆散的聯盟，由超過 10 個左派的政治團體所組成。其形成是在 2000 年開始醞釀，那時候多數的政治團體是在希臘和歐洲替代全球化運動下的。2001 年，上千的希臘左派加入了 Genoa 的 G8 高峰會抗議，那可能是最大的歐洲反全球化運動。許多參加者都是後來 SYRIZA 的成員，總之，SYRIZA 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誕生的，後來也取得國會席次。

歷史上說來，SYRIZA 是由四個傳統而

>>

來：共產主義（但在蘇共和歐共的只持者之間也有緊張關係），議會左派（緊張關係出現在托派、毛派、激進歐共派之間），替代全球化運動，以及希臘的改革社會民主，特別是再 2012 年選舉後該派瓦解 (Panhellenic 社會主義運動, PASOK)。SYRIZA 從 2009 年的 4.6% 的得票率到 2012 年的 27%，成長很多。同時 PASOK 則支持度下大幅下滑，從 2009 年的 44% 到 2012 年的 13.8%。而自從 1974 年的軍事統治結束後，PASOK 就和右派 Nea Demokratia 分享權力，但是 2015 年 1 月時 PASOK 的得票只剩下 4.6%，SYRIZA 則得到了超過 36% 的選票。

SYRIZA 還在繼續成長中。2012 年 SYRIZA 成為希臘最大的反對黨，然後慢慢的採取了改革的立場，邁向實用主義，並且在「4% 舊 SYRIZA」和「27% 新 SYRIZA」之間做出區隔，這個時期許多前 PASOK 的成員也加入了 SYRIZA。2014 年的歐洲議會選舉，SYRIZA 獲得了 26.5% 的選票，而且似乎將在國內選舉獲勝，組閣。他們要求黨員要「有效」且「安全」地確保選舉勝利，許多的 SYRIZA 領導開始吸引中間偏左的選票。

該黨的官方語言或口號也開始改變了。其「組成左派政府」的口號也變成了「拯救民族的政府」。「權力、財富、收入重分配以利勞工」也變成了「國家的生產重建」。民主、人民經濟、合作自主的非市場經濟等理念也被放到了一邊。

SYRIZA 的選前政見保證要終結摶節政策，並且處理那些公債。而 SYRIZA 上台後的幾週，那些政見被放棄了，讓位了給協商更溫和的備忘錄和議會同意書，由 2015 年的財政部長 Y. Varoufakis 簽字同意。Varoufakis 從來不是 SYRIZA 的成員，也不是左派。而且擔任部長之後，他迅速地和 SYRIZA 保持距離。他認為危機對每一個社會階級都有相同程度的傷害，主張出口導向，並且拒絕提高工資，否則會降低競爭力。因此，他常提到的 70% 的備忘錄有利於希臘的說法，並不意外。

然而，SYRIZA 在選前從來沒說要執行 70% 的備忘錄。若有，SYRIZA 就不會進到議會了。Varoufakis 的看法重新定義了 SYRIZA，並且重新洗牌的希臘的左派勢力。

2015 年的 2 月，一份協議清楚表示了希臘政府正在談判一個歐洲新自由主義的摶節架構，就是要找一個殼子去掩蓋真正的協議內容。這個殼子包括了一個「終結人道危機」的計畫（提供能源補助，食物券給窮人），以及拒絕工資和福利的刪減，並且保

持支持的遣散和基本貨物的增值稅係數。而政府則放棄了選前的政策，反而尋求對新自由主義有利的方案，希望可以免於中低受人的摶節。

然而，債權人從未接受那些提案，更不用說透過新自由主義去提供計畫去支持希臘的財金狀況，像是工資或是年金刪減 (Juncker 計畫)。透過 5 個多月的協商，雖然希臘繼續償還給歐中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債務，政府也從來沒有接受那些債權人的提案，這要一直到所有公共資金減少，和國際貨幣基金付款的延遲之後 (2015 年 6 月)，以及政府現金週轉不靈後才改變。那週，首相 A. Tsipras 發起了對於「Juncker 計畫」的公投，期待希臘可以減少銀行的提款（「銀行假期」或是「資本控制」），因為歐盟央行拒絕再借款給希臘銀行。

這個公投戰役彰顯了數十年來的階級和社會分化。所謂的兩個「希臘」相互抗衡，窮的受薪階級、失業、小企業主等投「不」。而高階級則說「要」。銀行關閉之後，媒體警告投「不」會帶來災難，而雇主都要工人投「要」。然而，2/3 的希臘人投「不」(61.3%)。但是在議會裡面，議員和保守反對黨聯合把「不」轉成「要」。2015 年 7 月，當 SYRIZA 簽署了備忘錄，該備忘錄被看做「Juncker 計畫」，並被描述成黑函的結果，也是歐洲教條精英、債權人、希臘之間鬥爭下的失敗。

這個詮釋呼應了 SYRIZA 內部的聲音，把備忘錄看成經濟的錯誤，會減緩成長，或是外國利益對於希臘攻擊。因此，SYRIZA 的最後同意書版本被某些黨員看成是「不公平戰役的歷史性失敗」，會在未來被同等的政策所翻轉，像是對付貪污或是現代化政府的政策。然而，摶節並不只是「錯誤的政策」，還是一個階級的策略，讓資本家得利，佔工人、失業人口、年金領取者、經濟弱勢的便宜。它也沒提供什麼權利給勞動者，沒有社會保障，低彈性的工資，沒有議價的權力。

在一些限制之外，完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和社會也可能會帶來一些政治危機，因為那會激起社會的抗議。這個政治危機是個強大的武器，因為工人階級和 SYRIZA 就企圖要取消摶節。可是這個武器有個前提，那就是 SYRIZA 必須堅持自己的政綱，維護優先的政策，以人民優先。

然而，這個策略被放棄了，因為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的成功讓 SYRIZA 轉向了改革的新自由主義，支持成長和穩定。這個轉變得根源其實在於 SYRIZA 執政之後的挑戰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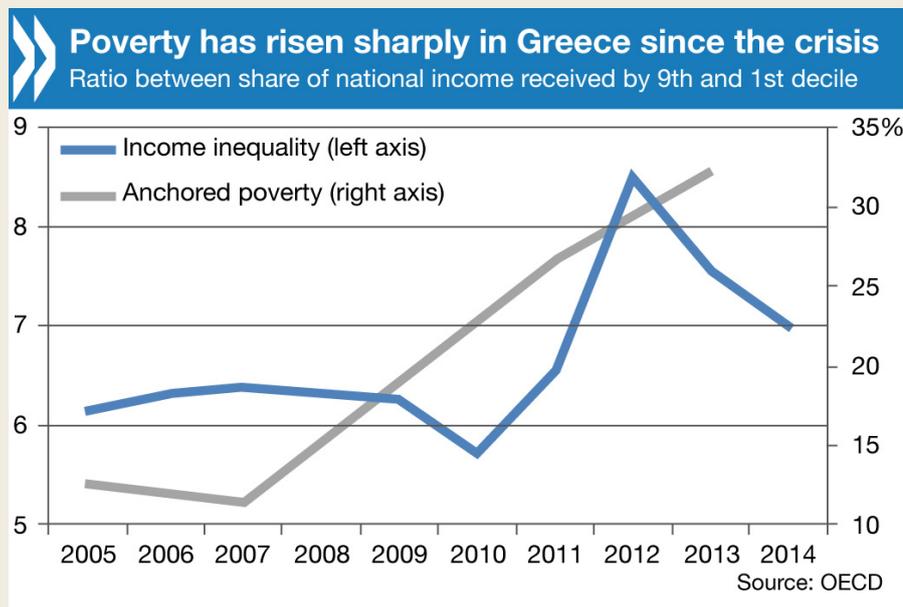
希臘後史達林左派的傳統裡。其愛國主義的改革可以從政府主義中看到，也就是組閣是一條邁向政治轉變的充分條件，而經濟主義則把社會變遷看成是生產力的變化，認為會帶來不可避免的生產關係改變。

在簽署了新的備忘錄之後，SYRIZA 同意清理希臘的制度和勞動市場架構。SYRIZA 仍然在希臘左派中實力堅強，但是 SYRIZA 比較像社會民主政黨，不是激進的左派了。■

來信寄給 John Milios <john.milios@gmail.com>

> 希臘金融危機的贏家和輸家

Spyros Sakellariopoulos, Panteion University, 希臘



從希臘金融危機之後貧窮和經濟不平等持續上升。

在 2010 年的時候，首相 George Papandreou 認為希臘的公共財政太過於慘淡了，所以整個國家無法在全球市場上借貸，因此無法再提供公債了。

和普遍的見解相反的是，希臘的問題並不是由於高工資而來的，也不只是政府太過浪費。希臘的工資只是歐盟 15 國的 83% 而已（這是 2004 年前的 15 個國家），若從總體的 GDP 來看，公共支出只是在平均值。希臘金融危機是國家統治階級造成的，並且來自於勞動的國際分工，特別是希臘 1981 年加入歐盟經濟體和 2002

年歐洲貨幣聯盟之後更是如此。希臘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和無法和單一貨幣競爭造成了 GDP 的崩壞和增加了債和 GDP 的比值。

無論如何，2010 年早期，希臘希望可以達到償還法國和德國銀行的目標，並且為了避免破產，於是決定要把貸款從歐盟、歐盟央行，以及國際貨幣組織中拿掉。

但是在希臘可以借貸之前，首先要去採行擰節措施。2010 和 2016 年之間，三個經濟的備忘錄被執行了，一個中程的計畫和八個特別方案，包括了其他的降低工資、年金、最低工資的

方案（從 751 歐元到 586 歐元，25 歲以下只有 490 歐元），增加增值稅從 19% 到 24%，給房地產業減稅，西的彈性失業方案，減少公部門雇員，增稅，等等。

而這些方案有多有效呢？首先，公債增加了，從 200 年的 3000 億歐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3144 億歐元。期間希臘經濟委縮了，公債佔 GDP 的比例從 126.7% 增加到 179%。同時，失業率從 2009 年的 9% 增加到 2016 年 5 月的 23.5%。GDP 從 2009 年的 2374 億歐元降到 2015 年的 1790 億。

這些統計數字揭露了那些政策的失敗，但是若再仔

細看看，就會發現那些政策造成了贏家和輸家。輸家是那些勞工階級（受薪階級和中小型農民），值得一提的是，只有15%的失業者領取失業補助，而40%的是可以合格接受補助的。無法接受補助但是合格的人口從11%增加到20%。今天，超過一百萬的希臘人其家庭裡面是沒有人有工作的，或是有人超過半年沒有工作。50%的年金領取者只領500歐元/月。從2009到2015國家總體貧窮率從27.6%增加到35.7%。

即使那些還保有工作的人，收入也減少許多。GDP總體從64%降到54%，總工資也掉了三分之一，平均購買力也從84%降到歐盟15國的平均65%。在2008和2015年之間，427,000的希臘人搬走，多數擁有大學學歷。2008年有849,289家企業，但到了2014年只剩下692,286家。不平等惡化了，富有的20%和貧窮的20%比例從5.6/1降到6.6/1。

希臘的人口資料也顯示了生活水準的降低。健康支出掉下了25%。2011和2014年間，出生和死亡人數都較少，嬰兒死亡率到增加了51%。

但是誰是贏家呢？在那些大贏家之中，多數是外國銀行，而這些銀行在金融危機剛開始的時候就持有大量的希臘國債。2010年6月，公有和私有的債總共有2521億美元，75.1%屬於法國（831億美元），德國（654億美元），和美國（362億美元）的銀行。2010年12月

前，外國銀行的持債比例降了42%，到了1457億（法國567億，德國340億，美國73億）。在第一備忘錄中，銀行可以有充裕時間賣掉持債，這到了2011年12月更明顯，因為總債降到了350億美元。2012年大選之前，外國銀行幾乎賣掉了手中所有的持債。

對於希臘的贏家來說，2010年最賺錢的公司獲利了22億歐元。2014年前增加到了102億。前300大公司（除了金融業）在2009和2014從53.6%增加到了59.8%的獲利，而資產也從42.2%增加到了44.0%。

最後，2011年的時候，445人有超過3000萬歐元的財產，總共500億歐元，是GDP的24%。2014年前這個群體又稍微成長了些，有565人持有總共700億歐元，是GDP的39.5%。在2014年，這個精英群體包括了11個希臘億萬富翁，總共資產到達180億。2013只有160億。

這些發展反應了希臘的社會階層化。按照調查指出的，希臘布爾喬亞佔2.8%的GDP，但2009年跌到3.2%，農業階層佔0.6%的GDP（從0.7%掉下來），小布爾喬亞7%（從7.3%掉下），新小布爾喬亞21.9%（從29.5%掉下），中間農業階級1.2%（從1.9%掉下），貧窮農業階級則有7.3%（7.4%掉下），工人階級則是59.2%（從49.1%上升）。

無論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些政策，這有著重大的意義。大型的外國銀行在國際

的金融制度和母國的引導下，不斷獲利。儘管某些部門的經濟液態化導致了損失，國家的經濟精英卻財富增加了，並且到過剝削在地勞工階級和中小企業的擠壓而得以可能。■

來信寄給 Spyros Sakellariopoulos
<sakellariopoulos@gmail.com>

> 希臘紓困 是國家和企業的聯合犯罪

Stratos Georgoulas, University of the Aegean, 希臘



| 紓困讓誰獲利了？

國際的學術社群已經開始試著去定義「國家和企業的犯罪」了，意即非法和社會危險的行動是透過國家治理制度和經濟生產與分配的互動所造成的。從政治和研究的觀點來看，這個詞是和「貪腐」連在一起的，但是兩者有重要的區別。首先，只所以稱為「犯罪」是為了保護人權，因為那些行動讓許多的人性命傷亡，損失財產，讓一般意義下的犯罪活動猖獗。第二，這種「聯合犯罪」的根源是和政治與社會行動緊密結合的，國家和資本也是相互依賴的，不論是直接把公共資源轉成私人交易，或世界由影響特定政策，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

此外，國家企業的聯合犯罪不只如此而已。所以，「全球化犯罪」有了個有趣面向，特別是當超國家的制度像是國際貨幣基金或是世界銀行對於整體人民造成了傷害的時候，更是如此。由上而下的政策和經濟方案和那些強國與跨國公司的行動大大影響了人類，特別是那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重新償債」

的計畫導致的政治不穩定，讓家父長或是恩俸侍從主義興起，增加組織的犯罪，貪污，威權主義，國家迫害，刑求，甚至是種族屠殺。

在希臘的備忘錄政策是由政府和國際組織所協商制定的，包括了那些國際放款銀行，這些都導致了違反人權的情況產生。那些政策在「紓困計畫」的名義下被執行，影響人民的生活，違反人權，這些都不被希臘或國際法所允許的。總總的經濟與社會後果包括了生活水準的降低，社會正義的侵害，社會團結的瓦解，民主與人權的違反。那什麼樣的人權被違反了呢？接下來我們就逐一討論。

- 工作權。由備忘錄所制定的勞動市場改革嚴重地削弱了工作權，造成了制度的崩壞。消滅長期以來的集體議價權和勞動仲裁被取消了，而薪資刪減和增稅也造成了裁員和勞動水準的降低，增加就業風險，讓女性和青年必須從事低薪和彈性的工作。最低工時被減少到了貧窮限的水平。

- 健康權。2010年的經濟調整方案限制了公

>>

共衛生的支出只能佔GDP的 6%。2012年的方案則減少了醫院的營運開銷8%。醫院和藥局的總支出也被迫從2010年的43.7億歐元減少到2014年的20億歐元。

- 教育權。備忘錄中刪減了教師的僱用名額，減少教師薪資，合併或關閉學校，增加班級學生數量，延長週末教學等等。許多教師名額空著，2008和2012年之間，1053所學校關閉了，1933所合併了。預算刪減讓許多學校沒有暖氣。

- 社會安全權。以備忘錄為基礎的支出刪減侵害了社會福利政策，包括了年金，失業補助，家庭補助。2010年開始年金又減少了40%，讓領取補助的人之中有45%成為貧窮人口。

- 居住權。希臘在2012年取消了社會住宅，這是一項「行動前行動」，為的是為了提供組金補助給120,000戶家庭和給老人補助的政策做準備。新的法律讓拆遷行動可更快速執行，不通過法院途徑。在2014年，有超過500,000人是無家可歸的。

- 自決權。國有財產的私有化，特別是經過「快速審查」的那些案子，事實上都是違憲的，因為憲法明定了人民主權、財產權，以及對環境的保護。
- 司法權。債權人提出制定的方案要求希臘政府要去改革其司法制度，包括提高訴訟費。法律途徑對於民眾來說已經越來越困難和越來越貴了，特別是他們的薪水和收入又被減少的情況下，更是糟糕。

- 言論自由權。2010的立法和行政方案中限制了言論表達和集會的自由。言論自由權倍系統性地挑戰，集會自由也被侵害。政府也禁止抗議那些備忘錄的法案，禁止公共集會，打壓和平抗議，逮捕抗議民眾，甚至刑求之。政府和法西斯色彩的政黨Golden Dawn合作打壓言論自由。

今天，有23.1%的希臘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而此貧窮率也再2009到2012年增加了一倍。而其中的三分之二甚至變得更窮了。嚴重的物質匱乏率(佔總人口)也從2009的11%上升到2014的21.5%。2013年有34%的小孩暴露在貧窮危險中，而10%的人口失去了 56.5% 的所得。

同時，希臘社會也歷經了違反人權的經驗，立法機構制定了「給特權階級的政策」，讓貪污猖獗。這個立法有很多面向，而且開啟了一種犯罪免罰的制度，讓一些特權的人可以免於被起訴，特別是那些有和政府簽約的公司，如西門子，或是軍火商和私有化政策有關的。該制度也讓立法機關可以介入那些已經在審判的案子。諷刺的是，即使債權人要希臘解決逃稅的問題，他們卻要取消26%的跨過交易稅。

國家企業犯罪是超出個人犯罪的，因為他們變成了常態，是這個失序社會的特徵，也就是

集體的代表和意識已經削弱了，這樣的國家企業共謀是這個時代的精神。

我們面對很嚴峻的挑戰：要做什麼才可以對抗這個不受控制的國家企業犯罪呢？這就像20世紀初期的法西斯主義一樣，有著正式的社會控制，現代制度，科學論述被治理、生產、社會的結構所扭曲了。

繼續懷有夢想是很重要的，而且，就算這個國家和企業的共生已經存在已久，但從來沒有被完全接受。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作為學者和公民，我們應該持續關注和質問。■

來信寄給Stratos Georgoulas <s.georgoulas@soc.aegean.gr>

> 米索前列醇時代的 阿根廷墮胎權運動

Julia McReynolds-Pérez, 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 Crosse, 美國



在聖母像上有女性潮流所留下的訊息：「妳的選擇，安全墮胎」，並且有熱線諮詢的店化號碼。

拉丁美洲的墮胎辯論經歷了場大地震，震央是一個白色小藥丸。米索前列醇的可取得性改變了墮胎的執行與實做，且影響很大。新的自助運動策略，其中包括了女性主義者和健康專業人士，也改變了墮胎的辯論。儘管合法化的反對聲浪很大，而運動者也讓墮胎更可取得，更可見。

墮胎長期以來在拉丁美洲就是不合法的，而拉丁美洲也是最天主教的地方，不過墮胎的執行卻是相當常見。拉美的富有女性已經悄悄地使用安全隱密但是昂貴的墮胎方式，但是貧窮的女性則往往使用高風險的方式墮胎。

這兩種隱密的墮胎方式激起了很大的辯論，關於合法性的問題是辯論重點。但是墮胎的執行和相關政治已經從 1990 年代改變了很多。米索前列醇是一種被美國藥物食品管理局所認可的合成前列腺素，主要用來治療造成泌尿感染的潰瘍，但這變成了墮胎的有效藥物。在那些墮胎合法化的國家，米索前列醇通常和其他藥物一起服用，像是米非司酮，主要用於第一起的藥物墮胎。重要的是，米索前列醇若自行服用，沒有經過醫師的協助，還是比密醫執行的墮胎要來得安全。

在 2012 和 2015 年之間，我在阿根廷做田野去了解這個新的藥理科技怎麼改變了墮胎的政治。在阿根廷（的確也在整個拉丁美洲），米索前列醇的輕易可取得性已經開啟了新的運動策略。許多墮胎權的運動人士與團體開始加入跨國的抗爭。2001 年 Rebecca Gomperts 博士展開了「浪潮上的女性」運動，把墮胎科技的船隻和國際浪潮帶入了那些墮胎不合法的國家，要請女性搭上這個浪潮，使用安全的墮胎。在這個

>>

米索前列醇，常用的引產藥物。



運動之後，她開啟了一個「網路上的女性」的運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可以購買墮胎的藥物或方法。其會把不標示的包裹寄給那些墮胎不合法國家的女性。Gomperts的組織也支持墮胎諮詢熱線，提供使用米索前列醇的使用資訊。

雖然 Gomperts 博士的跨國努力吸引了國際的媒體注意，但是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地方的運動策略如何回應新的機會結構。在拉美，年輕的女性主義運動者積極爭取女性使用米索前列醇的權利，讓貧窮的女性可以取得這種墮胎方式。有些團體提供資訊，其他則提供臨床服務，專業人士則開始介入整個醫療體系的改革。

同志女性主義支持墮胎去罪化 (Lesbianas y Feministas por la Descriminalización del Aborto, 簡稱 LFDA) 已經成為了過去 7 年來阿根廷最重要的墮胎權運動組織。LFDA 一開始設置了墮胎熱線，並設有「女性在網路上」，提供安全墮胎的資訊給阿根廷的女性。此外，從 2013 年開始，LFDA 設置了面對面的墮胎諮詢服務，主要在 Buenos Aires，運動者提供了完整的資訊，讓人們了解如何安全地引產，並以簡單，非技術性的語言溝通之。但是接受諮詢的人則要有辦法無論是從藥局或是黑市中拿到米索前列醇。

LFDA 就像其他提供類似服務的運動團體一樣，認為自己是受到「資訊自由」的規範所保護的，以及還有公共衛生對於「傷害降低」的要求。第一個論述是奠基在他們只有提供那些可以透過其他方便管道得

到的訊息。另外，他們並沒有提供墮胎藥物，所以不提供醫療服務，只有提供訊息。「傷害降低」的說法是從公共衛生領域的論述中借來的語言，類似提供免費針頭的概念一樣，宣稱要透過社會責任的方式去處理那些非法行為可能帶來的健康危險。

其他的運動者則更進一步。因為從 2014 年開始，地方的團體聯盟開始了一個名為「第一線上回應者」(Socorristas en Red) 的全國性運動，這個線上網絡不僅提供資訊，還有「補助」(acompañamiento)，像是米索前列醇或是藥理上的墮胎處方(但需要透過跨國的運動者去聯繫)，此外也有夠過手機提供在家墮胎的諮詢服務。因為這些團體提供墮胎藥，不只是資訊而已了，所以它們多數很低調。像是比較自由的城市如布宜諾艾利斯，其運作就比較公開。可是在許多的保守地方，運動者還有賴接受服務的人審慎小心行動才可免於受到起訴。

最後，有些健康專業者也開始從內部去改變阿根廷的公共衛生體系了，提供所謂的「事前事後的墮胎諮詢」。而像 LFDA 運動者，這些服務也包括了仔細的米索前列醇資訊，並且透過讓女性自己取得藥物或是在家墮胎而避免了合法性與否的難題。在一些的服務據點，這些運動者和專業人士也受到官方衛生單位的支持，或是受到的是善意的忽略。有些組織甚至可以將墮胎看成是「合法的中止懷孕」，認為那些非自願的懷孕是一種健康危險，所以所有的墮胎必是在法律的基礎上去保護女性的

健康。他們直接提供墮胎服務給看診者，但是我訪問的人告訴我，他們通常是私下提供米索前列醇，並且會要病患保密。

我們沒有辦法去正確估計有多少的醫生願意提供這樣的診斷，不過這些醫生一定是少數，因為在醫療專業階層的體系下，掌權者是那些保守的、天主教的老男人們。但是體系產生的更廣泛的影響則是很明顯的，特別是從運動者所收集的資料中可以看到這點，因為那些資料讓大家可以知道非法墮胎所反映出的健康議題。報告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論文也被專業醫療人員透過會議的方式公開了。此外，運動人士也撰寫了影子報告給聯合國的消除一切對婦女歧視之公約委員會。這已經變成我所稱的「女性主義流行」。

重要的是，阿根廷倡議藥物墮胎的運動彰顯了保守的國家法律上的失敗。的確，政治上其實很少人會真正想要起訴墮胎的實做，特別是若要真的起訴的話，其實會激起大眾對於年輕女性的同情心，他們會被看成是過度執法的犧牲者。按照運動者收集的資料來看，上萬的女性接受過中止懷孕的幫忙並且安全無恙。同時間女權團體也繼續要求墮胎的合法化。

然而阿根廷最近的政治變遷讓女性主義者處於不確定的環境中。2015年晚期，右派執政了，替換了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的中間偏左的政府，他們對於墮胎是持相反意見的。

最近國際人權組織譴責阿根廷以謀殺罪名處罰一名在 Tucumán 的年輕女性因為

在醫院尋求流產的協助，因為米索前列醇被廣泛使用，也因為其使用無法在事後被證明，保守派醫生傾向去懷疑所有流產的女性都有使用這個藥物。在這個情況下，Belén (化名) 被判8年徒刑，這是很重的刑，特別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持她的流產過程是否使用這個藥物。但判刑確定後，阿根廷各地的女權團體遊行要求釋放 Belén。政府在遭受到巨大壓力之下，2016年的8月，Tucumán 的法院釋放了 Belén。

而阿根廷的政權交替將會給墮胎權運動帶來阻力嗎？運動會被鎮壓嗎？會有更多的 Beléns 嗎？雖然這個右派政權很令人擔心，但是很運動者很清楚不會退縮，而過去20年來，他們的努力已經大大轉變了阿根廷的墮胎政治，而運動者也希望進步不會有所倒退。■

來信寄給 Julia McReynolds-Pérez <julia.mcreynolds@gmail.com>

> 墨西哥對墮胎權翻轉

Susana Lerner, El Colegio de México, Mexico, Lucía Melgar, 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 Mexico 和 Agnès Guillaume,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法國



墨西哥政府將要合法化墮胎。

2007年，墨西哥的聯邦區 (Distrito Federal, 近期改名墨西哥市) 將 12 周的墮胎合法化，這是對公民社會來說的一項勝利，因為公民社會自從 1990 年代開始就開始爭取。但是在墨西哥的多數地區，墮胎的限制卻越來越多。

從 2008 年開始，有新的法律和憲法改革被提出來要去「從懷孕的那一刻開始保護生命」。最近的一個案例是發生在 2016 年 7 月的 Veracruz。我們要問：是什麼導致了這些所謂的改革呢？而影響又是為何？

這些相關辯論和主要的行動者必須被放置在更廣泛的人口政治脈絡下來理解。從 1970 年代開始，墨西哥政府就推動的家庭計劃，目的是要減少生育率，提供女

性方法去控制家庭人口數量，並且改善家庭健康與幸福。儘管成功地減低的人口成長率，但是在缺發經濟和社會配套政策的情況下，人們的物質條件並沒有增加。

在 1990 年代，墨西哥政府再次肯定了 1994 年國際人口和發展會議的行動方案 (Program of Action)，所以國家的政策轉變到「生育健康」的焦點上。這個方案在 Cairo 簽訂，以性別和生育權利為優先，認為墮胎在某些不適合的情況下執行會是個問題，並要求簽署的國家允許女性可以取得安全的墮胎管道，並移除法律上的障礙和放鬆墮胎限制的法律。

在過去 20 年間，女權團體和學術專業社群已經不斷施加壓力給墨西哥市去合法化墮胎，也取得了進展。

2007 年，該市的立法機關同意了 12 週的墮胎 (雖然在一些情況下這樣的墮胎還是不合法的)。重要的是，藉著定義懷孕為「人類再生產的過程，開始於胚胎的著床」，墨西哥市的改革必開了生命何時在哪裡開始的討論。在 2007 的法律中，醫生或許可以拒絕執行墮胎而成為「良心上的反對者」，但是法律訂定健康機構必須要有不反對墮胎執行的醫生才可以。自由派政黨，包括執政的 PRI 投票贊成，但是右派政黨 PAN 則反對。

法律藉著要求公衛服務提供安全的墮胎，保障了女性的合法中止懷孕的行為。重要的是，法律允許懷孕女性可以自己決定要怎麼做，可以繼續，或是將小孩寄養，或是中止懷孕，只要在被告知同意之後即可。此

>>

外，避孕的措施也提供給那些非預期的懷孕的預防（然後減少將來的墮胎）。

因此，墨西哥市的改革把不安全的墮胎詮釋成為公衛、社會正義、歧視的議題，總之，其保護了人權，承認了女性可以為自己的身體與性作主和做出決定。過去的9年間，這個改革讓超過160,000的女性有安全墮胎的管道，而且不僅在墨西哥市，還包括其他可以到該市看診的人。

保守的勢力由天主教福音教派等所主導，他們很快就做出了回應。就像其國家，保守派堅持「捍衛生命」要求女性的自由和生命必須對胚胎權有所讓步，因為胚胎已經是「人」，並且拒絕承認不安全的墮胎現實，或是那些衍生的家庭和健康議題。另外一方面，女權團體則捍衛女性的自主權利，認為母職必須奠基在女性的自由意志上的，還有堅持政教分離對於未吸個民主的核心價值。

因為墨西哥市允許第一期的墮胎，像是Provida（支持生命優先），Profamilia（支持家庭優先），和墨西哥天主教法律協會的組織認為「生命開始於胚胎著床並且擁有權利」。反墮胎的人士試過了很多策略，包括了上街抗議，要求主教有所行動，限制女性取得墮胎方式，遊說立法等。相似地，他們反對同性婚姻（已經被合法化），並且反對家庭計畫和公立學校的性教育。他們成功地取消了「性與生育權利」的詞。

2008年，保守團體在最高法院判決前跑出來挑戰改革。雖然最高法院認為墮胎合法化是合憲的，其判決則是以另外3個事實為基礎。首先，法院明定了女性身體的自主權，而國家必須保護女性的權利，讓她們可做出關於身體或心理健康的決定。第二，法院判決生命權不是絕對權利，或是「超權利」，無法超越憲法或是國際法所明定的權利。所以當權利有相互衝突的時候，立法者必須考慮提供替代選項。第三，以第二點為基礎，法院讓在地的立法機關可以更改相關的法律。

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後，保守團體轉向州立法院，試圖去更改州的憲法或是刑法，要求「從受精最一開始的時候就去保護生命」，並且懲罰那些墮胎的女性。

在2016年中之前，反墮胎權的勢力在有天主教、所有政黨的立委的支持（包括了一些左派）之下，其在18個墨西哥的州達成了其目標。因為這些通過的新法案，墨西哥女性必須為了「謀殺親人」（亦即殺嬰）而坐牢，有些最重可判達20到30年。其他的還包括要接受心理治療，這意味著自己的身體自主性是個心理疾病。這些新的處罰代表了墨西哥政府無法遵守墨西哥的法律，因為法律明定在某些情況下墮胎士被允許的，像是強暴（這也是唯一全國都合法情況），胚胎異常，或是對母體健康有威脅。

2016的辯論仍然包含了

兩個互斥的立場。保守團體認為是「捍衛生命」，將女性的生命和自由從屬於所謂的胚胎權，並認為胚胎有法律地位。這些團體並沒有考慮到不安全墮胎的後果，像是母體死亡或是疾病，或是對於家庭的影響。自由派團體則強調女性權利的重要性，母職的自由選擇，以及健康的普世權利，要求墨西哥憲法中核心的對於世俗國家政府的尊重。

墨西哥爭取女性的權利的運動仍然持續著。但是女性團體再面對保守派要將墮胎入罪的時候，通常比較被動回應而非主動出擊。這樣的動態必須被改變。我們認為，公民社會必須奪回自己的聲音，要求全國層次的墮胎解放和合法化。■

來信寄 Susana Lerner
<slerner@colmex.mx>, Lucía Melgar
<lucia.melgar@gmail.com> 和 Agnès
Guillaume <Agnès.Guillaume@ird.fr>

> 墮胎作為暴力 秘魯的鬥爭

Erika Busse,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秘魯, ISA遷徙研究委員會(RC31), 女性與社會委員會(RC32), 社會運動、集體行動、社會變遷委員會(RC48), 家庭研究委員會(RC06)



反墮胎的「保護生命大遊行」，於利馬, 秘魯, 2013年3月23日。Paolo Aguilar/EPA攝影。

2016年8月中，上千秘魯公民到利馬的街上抗議，喊著口號：「Ni Una Menos」（不要少一個）。抗議者的身影中包括了剛剛當選的秘魯總統，性暴力的受害者，女權團體，政黨人士，還有立法委員。這個遊行譴責對女性施加的各種暴力，參加者包括女性、男性、家長、小孩等，

所以遊行也被描述成秘魯40多年來最重要的社會運動。

遊行抗議的高潮是放映了一部影片，影片中的女性在飯店櫃台前硬生生的被前男友抓住頭髮拖著走。但是這個案件的審理法官卻認為該女性的受傷證明了沒有強暴或是謀殺的企圖。

「Ni Una Menos」遊行的

>>

口號是「當一個女性受害，就是全部女性受害」，要求秘魯大眾一起抗議對待女性的暴力和歧視。遊行發起人對於大眾的回應相當驚訝，而這樣的回應也和拉美其它國家對於女性和法律的歧視所做出的回應是一致的。對於許多的拉丁美洲人來說，這個遊行是個希望：改變發生了，而女性議題，特別是暴力，也成為了公眾的焦點。

聚焦在女性遭受到的暴力的議題上是一個拉丁美洲女權運動的一個轉捩點，這也改變了對於生產權的詮釋框架。重新把關於墮胎辯論詮釋為「對於女性(弱勢)的性暴力」和強調「被強迫的母職」(或是被迫秘密墮胎)，女權人士重新把辯論引導到國家對於性暴力防治的失敗，這和把墮胎看成是生產權利的論述相當不一樣。

女性遭受暴力的這樣一個框架反對把女性墮胎視為是「自私」的行為，並且把女性遭受到暴力的迫害當成是道德議題。若要反對這個框架，那就必須要說女性沒有遭受暴力相向，或是不重要。不過，這樣的框架的確有可能弱化了女性，加強了性別的刻板印象。但是，這樣的框架似乎在墮胎合法化的案例中受到更多人的支持。

運動者不只是在合法化上面做努力，還訴諸公民社會的支持，也爭取專業和宗教人士的支持，試圖改變秘魯人思考女性權利和暴力的方式。從生育權利到性暴力防治的思維也讓運動可以擴大，把 LGBT 的運動者、女權草根、天主教、年輕人、名人等納入。強暴案例中的墮胎去罪化似乎得到了大眾的支持，而不僅僅是少數

女性主義者的背書而已。這個運動結合了由下而上(收集連署)和由上而下(電視廣告、名人、藝術家、政治人物、公民)的方式，並和團體如 Alfombra Roja (紅毯) 合作，招募到了許多支持者。在公眾不信任政府的氛圍下，這種運動策略也讓民主更加深化。

目前為止，這個新的詮釋框架並沒有辦法產生立法者的強大回應。例如，過去曾經有努力想要把強暴案例中的墮胎法化，但是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類似的還有國會中要把強暴案例的墮胎去罪行化的法案仍被束之高閣。顯然地，雖然立法者會同情遭受到暴力對待的女性，但是像強暴這種暴力所導致的非自願懷孕的案例中，胎兒或是母體的權利該如何對待還是辯論的焦點所在，暴力變成了次要的議題。

即使如此，公共相關的論述和政策還是有稍微改變一些。1924 年的秘魯刑法中是不把醫療墮胎當作犯罪行為的，只要懷孕女性是有危險的就可以，但是卻沒有明文允許醫療人員去提供墮胎的手術，這代表了醫生很有可能因為替病人執行墮胎手術而銀鐐入獄。而接下來的 90 年，多數的醫生都不太願意執行墮胎手術，

然而 2014 年的時候儘管有著廣泛的批評聲浪，特別是來自於天主教和福音教派的批評，秘魯最後還是採行了醫生有權判定是否可以中止危險懷孕的法規。不過完全的執行還是有困難，因為有些醫生不知道怎麼執行墮胎手術，女性也缺乏資訊，並且害怕和羞恥的情緒會讓懷孕的女人很難尋求協助。

這個法律的採納指出了把墮胎詮釋成女性的健康或許是

比詮釋成生育權會來的成功。就像「Ni Una Menos」遊行指出的，女性的議題或許已經移到了秘魯的政治辯論核心地帶了，但是不論是否將會帶來大的改變，特別是對於女性死亡的對待上是否會改變，我們不知道，還有待觀察。■

來信寄給 Erika Busse <e.busse@up.edu.pe>

> 簡介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學

Mohammed A. Bamy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美國,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編, ISA異化理論研究委員會(RC36)和傳記與社會委員會(RC38)會員

「新時代的新知識」可謂總結最近出版的報告「阿拉伯世界的社會科學」(<http://www.theacss.org/uploads/English-ASSR-2016.pdf>)¹。這是由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ACSS)所出版的,該報告的撰寫時間長達了兩年,並由許多的研究者貢獻而成。幾乎所有的資料都是一手的,並且是研究團隊所收集。

報告提供了量化和質化的資料,分析了阿拉伯世界的大學、研究中心、專業社群、以及期刊,試圖描述社會科學在阿拉伯世界的本質。此外,該報告也分析了公共的社會科學,包括了公民社會組織如何使用社會科學,以及公共領域的社會科學使用,像是報紙,電視節護,文化刊物,以及大眾雜誌。

我們也紀錄了在 22 個國家的社會科學機構的指數型的成長,特別是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成長。要指出的是,大專院校在 90 年代才開始成立,而學術期刊在 80 年代以來已經成長了 4 倍之多,研究中心則是至少 6 倍。可以說是一個寧靜的知識命正在阿拉伯世界發生但是我們所知甚少。

有趣的是,這種知識機構的擴張似乎和國家的財富是無關的,因為在有錢和貧窮的國家都看到這樣的趨勢。研究自由似乎是主要的因素。強健的公民社會推動並且受益於社會科學研究。知識階級、國際對於阿拉伯世界的興趣、以及在地組織和全球社會科學的連結等因素都有關。公民社會的成長則和社會科學的成長相關,兩者也和阿拉伯之春(2010 年展開)的解釋因素相關。

報告也紀錄了在阿拉伯的大學內部的不平衡現象。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的領頭

者,包括了四分之一的教職員。最少的是人類學,只有 2%,而其他則是介於這兩者之間。

然而,多數的阿拉伯大學非常重視較學,意謂著那些想要做研究或是從事民間活動的學者不會找到太多的誘因。而研究中心則填補了後面的這些需求,主要因為中心是透過主題而非學科去組織起來的,所以會比較推動跨學科研究和社會介入。

有趣的是那些富裕國家,像是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研究活動並沒有比較關注。這個發現直接地和最近的國際排名指標相抵觸,而事實上,這些指標對於反應真實的阿拉伯知識活動是沒有太大幫助的,部份是因為它們偏好那些發表在歐洲語言的特定其刊上面的活動。這些排名似乎只在乎學術的階層並助長之,而對內容並不感興趣,也不重視社會科學的相關性與使用。

報告幾乎有一半的篇幅是討論公共領域的社會科學。公民社會組織、報紙、大眾雜誌、電視、文化期刊等的分析顯示了社會科學知識通常以縮短的形式被呈現。報告發現了所有的公民社會組織使用甚至生產了社會科學知識,不過是以他們的目的所需求的形式呈現之。這也告訴了我們在阿拉伯攝科學的成長和公民社會的能見度上有某種相關性。而其他的公共領域媒體中,文化刊物對於社會科學的態度是開放的,大約有 20% 的篇幅是社會科學,但是是其文化社群所關懷的方式去呈現。報紙、大眾雜誌、電視節目中則比較看不到社會科學的影子。不過量沒有比質要來的重要,因為我們在巴勒斯坦報紙《Al-Quds》或是科威特的雜誌《Al-Arabi》中都看得到

「全面的社會轉型的阿拉伯社會科學的主要關懷。」

代表性的社會科學報導。

全面的社會轉型，不論是革命性的或是改革性的，都成為了阿拉伯社會科學得主要關懷，這特別發生在過去五年間(2010年1月到2014年12月)。我們對於這段期間的內容分析顯示了「阿拉伯之春」成為了社會科學家的最關心主題，其他的還有「民主」、「權利」、「裙帶主義」、「參與」、「公民社會」等等。報告也發現了女性議題也相當受到注意，並且在所有的媒體型態中都可以看到，也和權利、公民身份、參與等相關，而非和「傳統」的議題像是家庭或是小孩。社會轉型的議題，像是「青年」、「教育」、「發展」等受到比較少的關注。有趣的是，有些主題是缺席的，像是「穆斯林世界」。這個概念在西方是有意義的分析範疇，但是阿拉伯的社會科學家則幾乎忽略了它，應該是因為他們並不把「穆斯林世界」當作一個整體的分析類別。不過他們的確分析「伊斯蘭」和宗教與政治的關係。

該報告總結道，儘管政策制定者通常忽略這些研究，阿拉伯社會科學逐漸將自己形塑成當代阿拉伯知識地圖的重要一部分。未來的類似報告以兩年的時間為單位去進行規劃，目標是紀錄其對於全球社會科學和當地社會的貢獻。■

來信寄給 Mohammed Bamyeh <mab205@pitt.edu>

註1：Mohammed A. Bamyeh 是作者。

> 阿拉伯世界新社會科學的下層基礎

Seteney Shami, 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會長(ACSS), 黎巴嫩



第二屆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會議，2015年3月。

阿拉伯地區面臨了社會經濟、環境、政治、安全等的挑戰。同時，它也缺乏了強大的學術和研究能力去理解、分析、辯論、回應這些挑戰。就像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所指出的，阿拉伯國家對於知識的需要是

必須要有更好的能力、品質、範圍、以及影響，特別是社會科學。

這樣的覺醒已經讓許多過去十年來聚焦在這些挑戰的計畫不斷產生，並且也有更多的獎學金機會提供給學生去讀研究所。許多的學術成就獎項也被設

>>

置了，專業社群也緩慢的成長。可是，社會科學的機會和機構還是有限，並且阿拉伯地區的跨國機會也少之又少。

在這個脈絡下，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由社會科學家設想和發展起來。第一次的會議是在 2006 年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而當大家在規劃組織要接近尾聲的時候，中東被 2010 阿拉伯之春給震撼到了。這些事件幫助開啟了空間和辯論，並帶來了希望和機會去改變。對於現狀的質問和社會新視野的迫切需要，以及新的架構去再現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些都相當重要。街頭上就可以看到了社會科學的重要性。

運動之後帶來的是新威權主義、不安全、暴力、戰爭。但是，撒下的種子不斷地長大，不受到監視和迫害的影響。制度也擴張了，有趣的方案也提供了在制度上以及學術和運動之間合作的可能，也帶來的新的社會科學教育機會（像是線上課程、集體閱讀，或是 NGO 的「teach-ins」）。生產和保護學術的自由將會是這個地區未來的生命力。

➤ACSS

ACSS(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是一個非營利的會員組織，其總部在黎巴嫩的 Beirut。其主要的工作是去推動社會科學在地方和全球的發展(廣泛定義下的)。至今 ACSS 已經運作 4 年了，有 7 位全職和 2 位半職的工作、顧問、行政、

財政人員。ACSS 也在巴勒斯坦成立了分部，有半職的資深顧問和行政財政人員。第二個分部預計在阿爾吉利亞設置。ACSS 也設立了 4 個獎助計畫，提供研究經費、雙年的會議、雙年論壇、年度的講座，還有網站和社群媒體。其已經獎助了超過 130 位研究者，有超過 270 名成員，提供旅費和訓練，以及交流機會。

儘管在阿拉伯地區經歷了及大的變化，ACSS 原本的任務和價值是在 2008 年的一場會議中確定的，而且仍然有效，扮演重要的角色。(請見 <http://www.theacss.org/pages/mission>)。ACSS 的原則是推動質精、包容、彈性、獨立的社會科學研究，並且也評估需求，提供機會，注重年輕研究者的培訓和發展。

ACSS 的其中一個重點計畫是「阿拉伯社會科學關注」(ASSM)計畫，其分析了社會科學在該地區的近況，第一個報告「阿拉伯地區的社會科學」是由 Mohammed Bamyeh 所執行，分析了區域的制度和實質知識地景 (<http://www.theacss.org/uploads/English-ASSR-2016.pdf>)，描述了該地區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興起和成長。該報告也強調了阿拉伯世界社會科學缺乏了碩士和博士的設置，也缺乏期刊和專業組織等那些讓一個強健和批判的社會科學可以茁壯的制度。不過從好的方面來說，報告也描述了社會科學在公共領域中的角色，像是文學、報紙、大眾雜誌、電視、媒體等。

➤阿拉伯社會科學：邊緣化或是浮現中？

在阿拉伯地區，官方對於社會科學的忽略反映了發展和現代性的概念內涵。這兩個概在過去幾十年來主宰了教育和慈善的規劃，並且從傳統對於科、醫藥、工程的重視轉移到了財金、管理、等私部門活動。社會科學的地位也體現了該區域教制度的缺點，特別是高等教育。私人高等教育已經彰顯了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和社會科學的邊緣化。同時，學術界的聲音在公共政策的辯論中越來越小，因為政策制定者認為社會科學家的問題和現實世界無關，而社會科學家則批評政治忽略科學。

教育政策、發展的概念、對於公共領域的限制等，這些事實仍然和概地去的社會科學社群的積弱不振、對於自主知識領域的建立的無能為力有著影響。這裡有三個基礎的面向：對於累積經驗為基礎的、對抗霸權和意識形態的政治綱領的能力、對於影響政策的能力，以及去保護和推動專業興趣的能力。同樣重要的是，因為這些的制度弱點，阿拉伯社會科學家無法完全參與地區或是全球的知識網絡。阿拉伯社會科學社群仍然是在國際主要的網絡之外的，並且無法做出貢獻。

儘管從一開始營運都不是太容易，這些都是 ACSS 想要去處理的議題。研究環境也因為和持續升高的區域衝突而變得緊張，像是在伊拉克、利比亞、

>>

敘利亞、葉門等國家。例如在埃及，對於研究的監視和嚇阻是一直增加的。這影響了 ACSS 的區域影響力，也限制了其舉辦活動的能力。此外，某些國家的 ACSS 的受補助者被迫要改變研究計畫，並且減少研究的活動內容。最後，因為新的簽證要求和旅行限制，交通變得越來越困難。

但是儘管有這些或是因為這些困難的存在，ACSS 重要的是可以繼續提供支援和機會該地去的研究者，並且去建立更緊密的網絡。

我們很高興注意到受獎者的韌性，以及其及決心去追求研究的目標。計畫申請者的數量和參與者尚未減少，而對於 ACSS 的興趣則持續增加之中。黎巴嫩仍然是一個幫助區域整合和提供學術自由的國家。ACSS 也對於這個變化的環境和其活動與計畫的創造性有著很高的彈性與注意，並且也對於基礎的目的和價值持續支持。我們期待區域和國際的合作、交流，並且希望成為阿拉伯社會科學的再興媒介。

來信寄給 Seteney Shami

<shami@theacss.org>

> 阿拉伯社會科學

阿拉伯之春的前後

Idriss Jebari,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 黎巴嫩



阿拉伯之春對於阿拉伯社會科學有什麼樣的影響？

在關於阿拉伯社會科學的第一篇文章中，社會學教授 Mohammed Bamyeh 處理了阿拉伯社會科學現今所面臨的難題：一個在歷史上就像對薄弱的學科生長在一個豐富、動盪、複雜的社會環境裡面。阿拉伯之春至今五年了，已經有足夠的距離去批判地質問社會科學如何解釋了這個轉型。而該文又如何的描述了阿拉伯社會科學面對的挑戰呢？年輕的阿拉伯社會科學家又可從這之中學習到什麼樣的公共議題？

> 阿拉伯社會科學的挑戰

>>

已經有許多學者指出了阿拉伯的知識生產的質量不足。Bamyeh 的報告中清楚的避免重複那些常見的解釋，像是全球整合或是政治穩定性的缺乏，凡而是聚焦在相關的制度上面。他認為阿拉伯的社會科學家雖然沒有孤立，但是在社交能力上卻很弱，並且失去與那些形成的歷史特質失去了連結。總之，阿拉伯的社會科學並不一定是去在國際舞台上展現能見度，但是卻是做好研究和影響政策。而今天最重要的問題是圍繞在該學科和社會的疏遠，以及那些質疑科學價值的市場力量。

這個制度觀點把阿拉伯的社會科學定位在介於普世主義和地方主義之間。Bamyeh 似乎傾向前者，但是也承認這些學科已經和西方的社會科學互動頻仍，很難切割開來。他去看過去這段期間的文本的主題分布。此外，他也避開了「地方特殊主義」的議題以及對於方法的影響，特別是因為這些問題給阿拉伯社會科學帶來了許多難題（例如，在 Gellner 的宗派架構以及那些偏好布迪厄的階級中心的社會學）。然而，這些選擇繼續地形塑了該地去的社會科學研究，阿拉伯社會科學家也因為外國的文章發表也增加的能見度，也不論在主題或方法上都影響了研究的取向。

這篇文章裡 Bamyeh 的取徑提出了一個方法論層次上的「分析單位」的議題：當我們把阿拉伯地區當作一個整體，或是研究一個抽象的社會現象的時候，我們為了得到更普遍性的結論，於是在結論的部份才處理了國家和地方的脈絡，這麼做是有意義的嗎？作者援引了該地區 80 年代社會科學的「伊斯蘭化」，然後在討論家庭和犯罪學興起的現象之前，轉而細緻地討論沙烏地阿拉伯的個案。沙烏地阿拉伯在這現象是很明顯的，但是卻沒有討論其他重要的現象，像是社會衝突或是移工等也相當重要的問題。同樣地，Bamyeh 也討論了 Mokhtar El-Harrach 的對於阿拉伯期刊的背景研究，包括了跨國的比較，試圖去理解阿拉伯如何文化期刊如何發揮功能，發現理論研究佔了 68% 的內容。然而，他也指出了那些期刊的對話對象還是只有在地方層次，沒有連結到更大的阿拉伯世界，沒有提供對於如何造成不同結果的足夠解釋。類似的還有「研究密度」這個詞（研究中心總數除以國家的人口數）被用來分類阿拉伯世界的國家，但是「普遍供給養分給研究中心的氛圍」則是用來解釋對於「社會科

學」的興趣如何在不同的脈絡而有差異。作者承認一個更大的圖像是被其他的機制、誘因、施加在學術界的壓力等所形塑的，但是這卻沒有進一步細緻的討論。

作者也承認該報告是對於當前狀況的「調查」，是為了日後其他形式的發表用的。而後來的發表文章也會有不同的觀點，並且涵蓋除了 2010-2015 年之外的期間，並提供參考文獻。雖然這篇報告有所限制，但是還是成功地描述了該場域和形塑之的力量。

> 社會科學和阿拉伯轉型

Bamyeh 的社會科學制度結構的研究是該報告的最有力的貢獻，其提出了關於學術從業人員在公共領域所面臨嚴峻挑戰的問題。

他的呈現了阿拉伯大專院校作為社會科學「自然的家」（48% 的大學有社會科學系所或學位）。平衡了科系分佈是被至少有 436 個研究中心、專業社群以及 217 的學術期刊的網絡所支撐的。其資料也彰顯了一個有趣的趨勢：阿拉伯社會科學家的語言越來越跟國際接軌，然後阿爾及利亞和埃及的大學和研究中心佔了多數。

這些數據強調了另外的現實：阿拉伯社會科學家面臨著在知識生產累積、傳佈、以及推動社會變革之間的緊張關係。Bamyeh 討論了「非傳統行動者」的重要性，如公民社會。還有也利用了其他論文去強調 NGO 如何「不僅使用也生產了社會科學」。相似地，那些熟悉阿拉伯脈絡的人也知道泛阿拉伯的機構像是貝魯特的阿拉伯團結研究中心或是杜哈的阿拉伯研究與政策中心，其可見度都超越了大學院校。這些制度轉變給了關於這種轉變對於知識生產之影響之辯論帶來了很大的重要性。若是這樣，如作者建議的，這些中心若是無法取代學術研究機構，那是不是意味著「傳統」社會科學其實是有危機的呢？

Bamyeh 對於公民社會和社會科學的角色的評語顯示了他承認它們實際上的貢獻，歷史資料的建立，以及認識上的考量，但是也很顯然偏好「學術團體」而非「半學術團體」。作者認為那些在方法上嚴謹、生產進步知識、並且在學術上有地位的「學術人員和知識分子若要達成其目標，總是要保持某個距離，而不是掉進各種抗爭之中和再生產政治立場，說別人已經說過得東西。」同樣地，他在對於期刊和報紙的

>>

研究之中，其決定什麼才算得上是社會科學的方式包括了「深度」：「複雜度」或是「專業內容」。Bamyeh 顯然對於方法論選擇的證成比較在意，並且比較是學術研究而非政策導向的報告。

這些偏好說明了作者對於革命性認識論轉變的想法和對於社會科學在阿拉伯世界的想像，特別是在阿拉伯之春這種歷史轉變之後。作者其實保持著古典定義下的「革命」，並且特別其對於阿拉伯之春對於新生代阿拉伯社會科學的影響之考慮不夠周詳，因為阿拉伯革命的世代的社會鑲嵌形塑了他們的參與和對於改變的渴望。

Bamyeh 的理想的一種客觀、中立、超然的阿拉伯社會科學家想像也不代表了過去的典範。阿拉伯之春作為一種認識論革命可以帶來的是一種可以從把現實當作一個需要保持距離觀察的東西的這樣一種想法拉到另外一個有機的連結上，然後把期待帶進到研究之中，而不是試著要用嚴謹卻不適合的框架去規範社會科學。

>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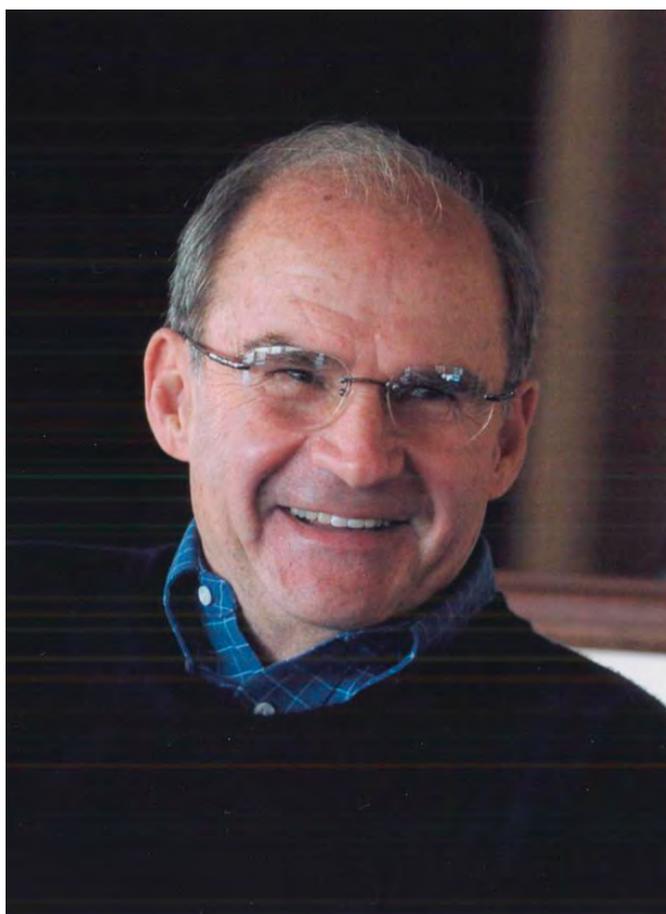
Mohammed Bamyeh 的到達點和我不同。Bamyeh 是去調查一個大的場域，並且看阿拉伯之春的前後發展，但只提出了該運動的成長和挑戰，卻沒有提出建議。他的結

論是說，在阿拉伯社會科學可以「宣稱已經帶入了社會科學的精神並且用多元的方法做研究」之前，必須歷經一場大變革。這個目標並非直線可達成的，也顯示了阿拉伯社會科學還沒有想出自己在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定位為何。

與其聚焦在社會科學的「現在」，或許我們應該問更動態的關於「持續」、「韌性」、「一致性」、「實質內容」。從「阿拉伯之春世代」的觀點，而非主題、制度環境、方法的角度來說，現在是讓阿拉伯社會科學變得不一樣的關鍵時機，也是尋找任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去設計更科學的研究議程。或許這個告會開啟更多的對話機會。■

來信寄給 Idriss Jebari <idrissjebari@gmail.com>

> George Ritzer 論麥當勞化和生產型 消費



George Ritzer.

George Ritzer是全球化理論中相當重要的學者。他也是美國Maryland大學的傑出社會學教授。Labinot Kunushevcic是科索沃的Prishtina大學的碩士生，訪問了Ritzer教授。這篇文章是訪談的節錄。

LK：Ritzer教授，你的「麥當勞化」概念相當有名。你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嗎？或只是一種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

GR：我從1990年開始以來的研究都直接或間接的處理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社會的麥當勞化》(1993)把「麥當勞化」當作這樣一股力量，其原則(效率、可預測性、計算性、控制、理性系統的非理性)從美國輸出到了世界其它地方。這些原則以麥當勞或是其他美國企業的形式全球化，並且也到了其他的組織(教育和宗教)。

在我的書《Expressing America: A Critique of the Global Credit Card Society》(1995)中，我處理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文化與經濟帝國主義：信用卡。這是一種美國的發明並擴散到全球世界各地。信用卡讓美國式的債務和消費文化全球化了，這也是我在《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ld: Revolutionizing the Means of Consumption》(1997)一書中直接處理的議題。消費工具的概念是從馬克思生產工具的概念而來，而美國的主要消費場域是連鎖的速食店、購物廣場、主題公園(如迪士尼)、拉斯維加斯式賭場、郵輪等。這些都擴散到世界各地並且成為觀光客的目的。這些大型且魔幻式，甚至宗教般的場所我稱之為「消費教堂」。一旦全球化，這些教堂成為了美國高度的消費社會的擴散媒介。

至少對我來說，我的書《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是這個主題中最重要的一本。我定義「nothing」為一種社會形式，一種沒有特殊內容的、被中央控制的形式。麥當勞和其產品(如大麥克漢堡)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其實沒有什麼東西(nothing)被全球化。這種全球的「nothingness」已經把許多在地的「某些東西」(something)給邊緣化了(在地控制的，並且獨特的)。因此，我們的全球化基本上是沒什麼東西的(nothing)！

LK：你把全球消費的概念延伸到大學，你對於現代大學的看法是？

GR：我通常把現代大學稱為麥當勞大學。意思

>>

是，教育透過強調效率、可預測性、計算性、控制，已經變得麥當勞化了。這個機制幫助設立了大眾的教育系統，但是理性系統的非理性讓品質降低了。這和速食店的食物品質一樣，你可以買到大麥克，而非好麥克。也讓大學繼續維持現狀，麥當勞大學越來越獨占和傳播知識知識生產。我最近的研究則是放在生產消費 (prosumption)，這是「生產」和「消費」的結合。學生總是生產消費知識。學生不只是被動的消費者，也是主動的生產者，生產那些蒸發和流出的知識。

LK：你是個多產的學者，想必有很多有趣的計畫正在進行，可以簡短讓我們知道一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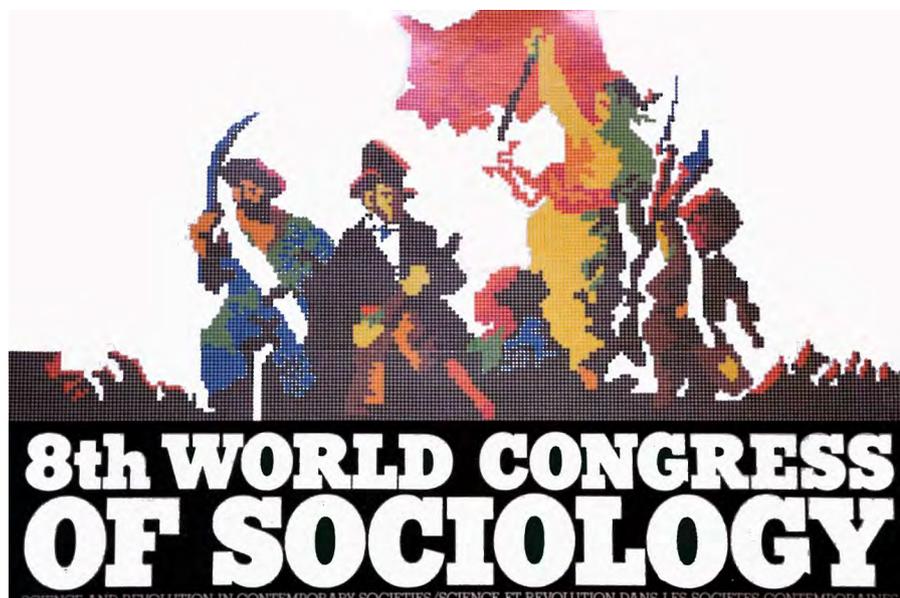
GR：我最近的研究放在生產消費上 (prosumption)。我們總是生產型消費者，從來不只是生產者或是消費者那麼簡單而已（這是一種必須遺棄的現代二元對立）。順便一提是，生產消費者的場域是網際網路，並在部落格或是臉書上進行生產消費。我們也越來越多地在消費教堂中進行生產消費，我們作為「消費者」做了越來越多的「工作」，那些工作之前是由雇員進行的（想想我們在速食餐廳、購物廣場、IKEA 等做的事情）。我最近也開始去論證我們都活在一個「生產消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寧願付錢給生產消費者，而非工人。

Uber 就是最好的例子，計程車司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開 Uber 的生產消費者。當我們從 Amazon 買書時，我們不只消費，也在生產，於是工人不見了。結果就是新的資本家 (Mark Zuckerberg, Jeff Bezos) 成為了億萬富翁，用生產消費者取代了傳統的工人。生產消費者是無償的，而且還不是員工，所以可以省下許多錢，還不用幫他們買保險。新的科技（像是機器人）將會讓企業依賴生產消費者（或是他們自己作為「生產消費機器」去生產消費）。■

來信寄給 George Ritzer <gritzer@umd.edu> 和 Labinot Kunushevci <labinotkunashevci@gmail.com>

> 與全球社會學 超過40年的關係

Edward A. Tiryakian, Duke University, 美國, 社會學歷史委員會(RC08), 社會學理論委員會(RC16), 和宗教社會學委員會(RC22)委員



ISA於1974年的世界大會，於加拿大的多倫多，這是Edward Tiryakian參加的第一次大會。

我很榮幸被邀請來分享我和ISA的過往經驗。不過要說在前頭的是，我的回憶未必完整和精確。讀者毫無疑問的可以看Jennifer Platt的文章並且受惠：[A Brief History of the ISA, 1948-1997](#)。

國際的場域一直對我很有吸引力，並且和社會學理論一樣是我非常有興趣的部份。我也是美國社會學會(ASA)的成員，且任職於其國際合作委員會，且成為該委員會主席，而前任主席Reuben Hill則是ISA的會長(1970-74)。Reuben希望美國社會學可以走出美國，他也邀請我加入了ISA。我第一次接觸是在1974年，Reuben那時邀請了蘇聯的社會學家去參加ISA的第八屆Toronto世界大會。而那之後，各國代表則參加了在蒙特婁的ASA年會。

在者兩個場合中，國際合作委員會提供了海外學者的聯繫橋樑。我特別記得和俄國社會

學家的互動，冷戰氣氛很快消失，因為大會的氣氛非常愉悅。對於Reuben Hill和ASA的會長Peter Blau來說，這聯合的會議證明了社會學外交的成功。

在這之後，我申請了ISA的終身會員，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投資了。在Uppsala的第九屆大會上，我還記得大會非常成功，而且瑞典的開銷很貴，但也很現代。或許Uppsala(不像Toronto或是Stockholm)是個大學城而非大都市，所以有很多機會可以和各國的學者認識，這也是國際會議吸引人的地方。

在Uppsala之後，第十屆大會在Mexico City(1982)舉辦，有許多的西班牙語場次，那是ISA的第三官方語言。會場中也一直被Alain Touraine提醒要感謝拉美的學者。Touraine一直是世界社會學的支持者，無論在國際會議上或是法國的研討會上都是如此。

>>

該次大會我們卻經歷了財務上的混亂。墨西哥的財政部長宣佈該國無法償付債務，因此產生了金融危機。ISA 的與會者要兌換美元，但是匯率卻讓人搞不清楚。匯率一夜之間就變了，但是分行都不知道墨西哥央行的匯率。有些使用信用卡的與會者發現可以從標準房升級到貴賓房，因為披索貶值很大，美元升值很多。也不是所有人都得利，很多人趕快就離開墨西哥了。

這是唯一一個我記得在這個危機事件期間參加的 ISA 會議。在 Madrid 的大會很好，除了沒有空調和酷熱之外。在 Bielefeld 的 13 屆的大會 (1994) Richard Grathoff 邀請了波蘭和其他東歐的社會學家，他們在蘇聯的壓制下仍然相當有活力。

我和 Grathoff 有很多相似之處，他把質化、詮釋取徑的社會學放在社會學理論化的核心位置，而我也很高興他要我繼續在《International Sociology》期刊上擔任編輯委員 (他在 1991-1996 擔任主編)。我加入的時候，Martin Al-brow 是第一任主編 (1984-1990)，而我很榮幸成為作者和審查者，因為這是一個推動比較全球社會學的刊物。

雖然說要參加全部的 ISA 大會是很難的 (因為退休後的旅行費和對 ASA 的職責，ASA 的會議和 ISA 都在同個時間)，但是我還是很榮

幸地參加了最近的大會蒙特婁 (1998)，布里斯本 (2002)，哥登堡 (2010)，橫濱 (2014)，和在維也納的世界論壇 (2016)。我也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相見 (但是越來越少了)，交新的朋友，並且激盪新的社會學點子。這些對我的吸引都還是和我第一次加入 ISA 的時候一樣，而且我確信也一定要參加 2018 年在多倫多的 19 屆世界大會。■

來信寄給 Edward Tiryakian <[durk@soc.duke.edu](mailto:edurk@soc.duke.edu)>

> 介紹日本編輯 團隊

我們很榮幸可以向讀者們介紹日本的編輯團隊。這個團隊從 2014 年的 12 月開始負責日文版編輯，大學生加入了我們這個團隊。他們是國立水產大學的學生，該大學於 1941 年成立，是一所由農魚森林部認可的公立大學。以下介紹這個團隊。



Satomi Yamamoto 是英文與社會學副教授，隸屬於漁類分布與管理系。她從日本女子大學的英文系獲得碩士學位，University of Chicago 獲得社會科學碩士，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獲得社會學博士。她的研究聚焦在美國入侵魚類的社會學分析。



Fuma Sekiguchi 是食品科學和科技系的四年級大學生。他在山口縣出生，於千葉縣長大。他目前休學前往美國的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和 Chico 和 Butte College 進修。其座右銘是失敗為成功之母。他喜歡游泳，棒球，讀英文。



Yutaro Shimokawa 是食品科學和科技系的二年級生。他正在研習海洋產品的食物組成、處理技術、有效使用。他加入團隊是因為想加強英文的閱讀能力，目標是去閱讀食品科學的英文學術文章。



Masaki Yokota 是魚類分佈和管理系的四年級生。他在 2014 和 2015 年時在英國唸英文，獲得 IELTS 的 6.5 分。他喜歡打網球和看足球。他最喜歡的是 London 的 Chelsea Football Club 球隊。夢想是環遊世界。



Takashi Kitahara 是魚類分佈和管理系的四年級生。他將會於 2017 年 4 月就讀食品科學和資源管理研究所。他的大學論文研究日本水產養殖的企業。他會加入翻譯團隊是因為喜歡學習主修科目之外的東西。



Yuki Nakano 是應用海洋生物學系的二年級大學生。她決定唸國立水產大學是因為從小喜歡動物和魚類。還沒有決定未來的就業方向，但是她希望可以找到與其主修相關的工作。她有時候覺得翻譯英文到日文相當有挑戰性，但是很高興可以加入團隊，因為可以幫助增進英文和日文。